

五

陈戌国 撰

四

四書五經

校注本

一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礼记

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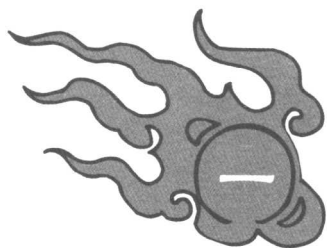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

書

四書五經

校注本

◎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 ◎ 礼记



陈戌国 撰

岳麓书社

四书五经校注本总序

中国古代近代的经学遭到严酷的空前的批判，始于上个世纪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整整十年的大革文化命，更把对经学与孔子的批判推上了顶峰。早在“五四”运动前后若干年，经书经学被宣判为“古衣冠的僵尸”。大革文化命的年月，据说已将孔老二再次打倒，将经书经学定性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如果说“五四”运动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宣传与对经学的清算为启发民智、解放思想所必须，只是那偏离理智的狂热终究在历史的检验面前难免令人遗憾；那么，后来大革文化（包括经书经学）命的浩劫，就未免让人觉得十分可笑而且可恶了。

公元2001年，距离上世纪的“五四”运动已经八十馀载，告别大革文化命的时代也已二十多年。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栏的首篇《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如下的综述中华学术的议论赫然在目：

乾嘉学术的核心是在经学。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说中国学术的核心在经学，是就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道，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

大学者评价经学到如此高度，上世纪委实罕见，而新世纪此时始闻之。没有非凡的穿云破雾的洞察力，没有源于真知灼见的巨大的学术勇气，谁敢说经学原本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呢？凡是尊重历史、尊重学术的文化人，只要认真思索，都应该承认：中国经学史固然积弊不少，而经学本身终以精华为多。谁能说学勤先生言过其实了呢？难道中国古代史上曾有别的什么能够取代经学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吗？

从学勤先生的高论得到启发，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林林总总思索有年，自觉大体上弄清楚了若干问题。已知前修时贤关于中国学术多有精辟之言。在反复证实了他们的种种见解之后，如果加以融汇贯通的工夫，一以实事求是为上，那是可以就中国古代的学术（包括经学）与学术史（包括经学史）略述梗概或心得的。其要有七。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只能是解说、研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汉以后附加《论语》《孝经》与小学，宋以后加上《孟子》）的经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术盛行时间如此之长，包罗内容如此之广。如果不是这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就会丧失殆尽。此其一。

昔司马迁论六经要指，充分表现了他熟谙六经的学识。“《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六经各有所长，各有其显著的学术特色。联系后世通行的学科分类，《易》是讲哲学的，《礼》是讲行为实践，讲伦理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书》和《春秋》是讲历史是非的，《诗》和《乐》是讲文学乐舞艺术的。然而人为地划分界限并不完全符合各经所有的内容。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经学几乎没有不涉及的。太史公说的只是各经的主要情况。他论六经与他的父亲论六家要指一样具有权威性。此其二。

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当然有列于经学之外者，然而惟有经学才是当时学术的中心。诸经各有其主要分野，然而诸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平列的呢？历来有《易》或《诗》为群经之首两说，经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各执其是。但是没有说《诗》为经之原或经之本的。倒是《汉书·艺文志》早就说过六经“《易》为之原”。鄙意：六经（后来《乐经》亡佚，已是五而不六）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都很重要，可是六经之间并非平列关系，而与《汉志》不同的说法确已

存在。至迟初唐以前就有学者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这话是南朝梁皇侃说的，而初唐孔颖达等人援引之，突出《礼》在六经中的地位，这个观点毕竟已见于小戴辑《礼记·经解》的孔疏了。后来吾湘经学家皮鹿门先生作《经学通论》，其中有一条目为“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此条正文一开头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皮氏以为《礼记·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正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换一个视角看：《礼》之外任何一经与他经的关系，都不如《礼》与他经关系之“切要”。我们相信：学术之贵，在乎经世致用。质言之：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都不会重视对于当时的统治、当时的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帮助的所谓学术，而与统治阶级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保护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经济利益的政治，而统治阶级此类意识形态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牵涉政治与礼的关系。《礼记·哀公问》记孔子的话：“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者长于行，礼者政之本。礼的经世致用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建设与礼学教育。属于经学的其他诸经本来就没有谁离得开礼，如皮鹿门所言：“皆有礼在其中。”张惠言《虞氏易礼序》：“《易》者，礼象也。”《周易郑荀义·略例》说到“易三义”，又说：“其言爻象消息皆变易也，礼制经论乃不易也。”曹穀荪元弼先生《礼经学》：“《书》者，圣人以礼治天下之实政也。”王安石《答吴孝宗书》早就说过：“《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早就说过：“《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至于郑康成《六艺论》说的“善于礼”的《左氏春秋》，这里就不必说了。让我们再说到《周易》。《易·系辞上》：“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根据是什么？“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那繁多的爻位之变，难道不是以礼制原则为根据吗？这里伴随着相关的疑问：六经“《易》为之原”的说法究竟该作何理解？难道《书》《诗》《礼》《乐》《春秋》之“原”都在乎《易》吗？我们认为：《易》长于变，这个

强调“变”的思想原理为六经所证实。礼也会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总该变得适应社会的需要,才会有永恒的生命力。礼学也是如此。与五经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学术莫不如此,所以说“《易》为之源”。然而,由于诸经之撰作都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或缺的礼仪礼典的实行之后,包括《易经》在内的经书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社会“政之本”的礼制,所以说“总以礼为本”。●此其三。

其四,应该说到经学与史子集部之学的关系。吾湘近代经学家王壬秋弟子为王氏编辑诗文集《王志》,其卷一论“子史不必读”,写道:“为学但当治经,读子史者失学之人也。”我们不敢附和此说。说“为学当治经”,不错;说“为学但当治经”,加一“但”字,这就不对了。我们认为经史子集之学都应该学,都应该治。一则史子集部之学自身重要,其内容与作用非经学所能取代;二则史子集部文献或者可以证明五经文字,或者可以证经学道理。

其五,应该说:作为儒学中心的经学不必排斥佛道二氏之学。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六:

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

朱棣认为儒学五经可以帮助他治理天下,而《道经》无用,帮不了什么忙。王伯申《经传释词》卷七解释文言语词“耳”,说:“犹‘而已’也。”从“五经耳”句可以推断,在永乐帝朱棣心目中,佛经也是没有用的。其实,佛道虽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但决不是无用之物。就中国魏晋以后学术大厦而言,佛道二氏之学无疑也是支撑大厦的栋梁。(而中国道家道学的历史不会短于儒家儒学。)它们对于各相应历史时期的统治都是有用的,不知朱明太宗为何不肯承认二氏之学的价值、地位与功用。他的父皇和他的后嗣并非如此。

其六,《论语》《孟子》多记孔子孟子的话,《大学》《中庸》相传

①拙撰《论六经总以礼为本》、《经学札记三则》已畅论礼书礼制与其他经书的关系,请参看。

分别为曾参、子思所作，已被历史证明其中大部分言论确有道理。既如此，将这四种文献视为经书可以说是对的。汉代学者与宋代学者先后将《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列入经学，表现了非常有远见的眼光。然而必须指出：南宋以后兴起的“四书学”，固然是传统经学发展的重要产物，已经在经学史里占有重要位置，但它毕竟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有人坚持“朱熹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观点，既背离史实，也不合道理。

还有其七。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有学者宣布了经学的死亡。那么此后的“《易》学”研究、“《尚书》学”研究、“《诗》学”研究以及“《礼》学”研究算什么呢？刘起钊先生的《尚书学史》、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算不算经学研究呢？近年编辑出版的《经学今论》算什么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华书局陆续整理出版了成系列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有力地推动了经学的普及和经学研究的深入。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与经学研究有关的大型活动，最有影响的也许要算是2003年11月中旬的“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上旬的“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两会地点在大陆的清华大学甲所。高度重视经学及其研究的李学勤先生是研讨会的主要主持人。为数不少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台湾学者1997年成立清代经学研究室，此前此后，在经学研究目录的编辑、经学典籍的标点整理、经学家研究资料与经学史研究诸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自公元2002年起，台湾的清代经学研究室诸君，由林庆彰先生率领，“推动晚清经学研究计画，采分年进行、从各地区入手之方式，以凸显各地区经学研究的特色”（看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发行的专刊《中国文哲研究所》）。其计画之宏伟，方式之切实可行，值得击节赞赏。诸君揭橥“经学研究”的大方案，如果认真实施，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应该可以产生推动作用。看来经学已经复活，现在是生机勃勃。如果承认中国古代学术中经学的中心地位，为什么不能承认经学研究的继续呢？经学没有死，经学不会死。数十年来，经学研究实际上已经

融入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以及语言文字学诸领域的研究了。中国古代经学既为中国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应诸学科之源，又伴随诸学科的发展而获得新生或者繁衍，这和传说中的凤凰涅槃不死是不是有点相似呢？君不见中国大陆的党政领导人，海峡彼岸在野党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在祖国传统经书经学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们有亲手点校的《四书集注》与《周礼仪礼礼记》白文本问世，九十年代则有《四书五经》点校本出版。拙著《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脱稿于公元2001年底。自2002年以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书五经》的校注工作与出版后的《四书五经校注》各册的修订工作中度过的，至今快五年了。若论读经书治经学的工夫，至迟可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忝列郭君重晋稀先生门下做研究生算起，二十六年了。我们之于经书经学，“尽心焉耳矣”。而今年过耳顺，于经书经学竟不敢说已经无惑。这里敢说也不能不说的意思，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如下：愿意继续用功学习。但求与时俱进就好。期盼专家学者继续赐教是幸。

是为校注本《四书五经》总序。陈戍国 2006 年 5 月 4 日深夜三时二十分写于湖南大学友谊村之三楼。

说明：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四书五经点校本序》，读者可以从岳麓书社 1991 年出版之后多次重印的白文本《四书五经》看到。现在写的《四书五经校注本总序》，就思想而言，自是十五年前那篇序的续篇。这里向那些给我写续篇的机会的朋友们致谢了。陈戍国谨识。

四书五经校注本总目

第一册

大学	(0007)
中庸	(0025)
论语	(0061)
孟子	(0171)
礼记	(0329)

第二册

周易	(0813)
尚书	(1001)
诗经	(1199)

第三册

春秋左传(上)	(1653)
---------------	--------

第四册

春秋左传(下)	(2289)
---------------	--------

四书校注序

唐代韩退之、李习之、赵宋司马君实与二程对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古代文献已经重视有加。特别在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书》为士子必读、熟读之书。因为不这样，莘莘士子就没有进身之阶。当时统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书》里，士人读好了《四书》，才会得到赏识。明清两朝已有少数人反对《四书》的孔孟之道，嘲笑让《四书》禁锢了头脑的儒生。清亡之后，《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遭到两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批判：一次在上世纪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在上世纪的“文革”时期。经过这两次大批判，特别在后一次“革命”之后，《四书》在扫除之列，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命运与《五经》一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中，不知《四书》为何物者居多。

可是时至今日，不知《四书》为何物的中学生不多了。大多数中学生知道：《四书》（又称《四子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论语》一书大多是孔子的话，《孟子》一书大多为孟轲的议论。知道写《大学》者传为孔子学生曾参，写《中庸》者为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中学生也很不少。

不是因为《四书》又成了读书人找出路的阶梯，而是因为《四书》宣扬的思想和大部分毕竟应该归属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是《四书》与《五经》相同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现代国民（包括肩负中华民族希望的年青人）怎么会接受《四书》之类的古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要《四书》（还有《五经》）何用？

孔子讲过的话，当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然而试看《鲁论

语》，从第一篇《学而》到第二十篇即最末一篇《尧曰》，从《学而》开头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尧曰》最后三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总归是大多有些道理。这里引录的六句话，除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句不能让现代人无疑，其他五句都是对的。《论语》记录的孔子的话，上个世纪以来最为人们所不满的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惹恼了大多数人（其中光是妇女就占了半边天）。其实，这是由于两千多年来人们误解了孔夫子的原意，我们已在《论语·阳货》有关注释中阐述词源，以正视听。不能说孔子这句话的原意根本没有问题，然而可以说：问题并不像历来人们所批判的那样严重。

《孟子》的问题大于《论语》。韩退之说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①我们倒宁愿说：“孔与孟，大醇而小疵。孟之疵，实多于孔。”孟子学霸气太盛，不如孔子谦和。然而，他的一句“民为贵”，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了。

《大学》《中庸》篇幅远不及《论》《孟》，然而各自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而同样不朽。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宣传的思想。为国为天下，从我自己做起，从我自家做起，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从我自己做起，就必须“慎独”，这也是《大学》提倡的重要思想。《大学》还告诉世人“生财有大道”，这个“大道”已经引起国家当代领导人的注意。^②《中庸》宣扬的两个平凡而伟大的道理，一是中庸之道，一是慎独之道。这里说“慎独”，应迟于《大学》，与《大学》说的修身，《论语·学而》记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与《孟子·公孙丑上》说的“不动心”之道，无疑有相通之处。而中庸之道实难能而必备，无论个人、政党与国家都不应该有悖于此道。非左即右总有偏差与损害，不左不右最

①见《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读荀》。

②见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好。可是要真能中庸并非易事,所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合而言之,《四书》说的是真正的孔孟之道(《五经》则未必都是,甚至可以说大多不是)。曾经有过不屑或者不准或者不敢谈论孔孟之道的岁月。革命者认为孔孟之道和宣扬此道的《四书》只是朽腐,只是反动,只是垃圾,毫无价值。其实《四书》和孔孟之道本身的错误以及罪恶并不多,成为问题和罪恶的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利用《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为自己服务,而秉承统治阶级意旨的文化人宣扬其中确实存在的腐朽甚至反动的东西,或者歪曲其中某些观点,让这些东西禁锢了为数很多的不能用自己的脑袋明辨是非的士庶人的思想。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四书》(还有《五经》)宣扬的思想意识,其实有些部分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才能接受和利用,而是大多数人甚至全人类的思想财富。就说孔孟之道吧,此道有关乎中国古代修齐治平之术至鉅,于今还可资借鉴。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而言,熟读《四书》,了解孔子经由曾参、子思而传至孟子的儒家道统,这有助于把握从孔子、曾子、思孟学派到宋元明清理学与心学诸子的思想脉络。所以,前文就《大学》《中庸》言及所谓实践与理论意义,即使扩大到《四书》整体,亦未尝不可以言之。

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如下四点意思:

一,所谓“四书学”,只是经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四书学”是经学发展到南宋及其后的产物。四书之中有《大学》《中庸》两书,本来只是小戴辑《礼记》的两篇文章。所谓“四书学”与“五经学”,这两个大概念中有部分的交叉。这都是常识。既如此,怎么能说用“四书学”取代“五经学”呢?如果说《论》《孟》之学与“五经学”对举,那倒是没有概念的交叉与混淆了。

二,朱熹有《读论语孟子法》一文,其中引程子语:“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论语》《孟子》与六经(《乐经》亡后为五经)有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论》《孟》不可能取六经地位而代

之,《论》《孟》之学不可能取代《五经》之学,因为代替不了。《论》《孟》记录孔子孟轲平时的谈话,比《五经》浅显。就内容范围与所论深度而言,《论》《孟》凭什么取代《五经》呢?《论》《孟》之学能取代《五经》之学吗?如果清朝以前的经学只有《论》《孟》而没有《五经》之学,岂不黯然失色?

三,据说元代就有以四书学取代五经学的举措,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就我们所知,元代儒学名人看重所谓“四书学”,只不过视之为进身之阶与入学初步而已,何曾胆敢弃《五经》于不顾?许衡撰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课蒙之书”而已^①,能取代他的《读易私言》吗?吴澄撰《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又岂是元人关于《四书》的著述可以取代的呢?也许有人会说:元延祐后科举只考《四书》,那还不是以《四书》学取代了《五经》学吗?我们要问:科举考试能够算是真正的学术吗?有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的各级考试(包括高考),能够取代学术界的学术事业吗?显然不能。

四,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②他自有其道理,读书人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读《四书》。但是不一定非按他规定的顺序不可。我们的意见,就按通行本《四书》排列的顺序读下去好了。或者依四子在世先后,先读孔子,次曾子,次子思,然后孟子,又有何不可?

朱熹又说:“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③这样讲,又有是有非。书不读,理不明。然而读书要循序渐进。比较而言,《四书》“易晓易解”,不是最难读的书。人们从《四书》可以学到好些道理。这样说是对的。可是,如果说读《四书》容易得很,则不尽然。如果说读了

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六。

②③《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大学一·纲领》。

《四书》就什么书都能读了,什么道理都能懂了,什么事情都能办了,亦不尽然。举例说,读罢《四书》就能一下子读懂《五经》了吗?怕未必。朱子一生于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多有研究,贡献很大。他著述甚富,在《易》学、《诗》学、《礼》学、《四书》学诸领域都有可以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力作问世。但他的经学研究毕竟有些缺陷,他自己就没有做到“无书不可读,无理不可究”。我们当然不应该苛求前贤,因为我们更做不到无书不可读,无理不可究,无事不可处。我们知道朱子讲过不少道理,但他也讲过一些过头话,讲过一些不够有道理的话。上面引录的朱子的话,也许只是为了提倡读《四书》罢了。我们的意见,总之一是:学海无涯,而《四书》实实在在值得多读。

希望我们的《四书校注》对读者诸君有益。不当之处难免,随时恭候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陈戍国 2003 年 11 月写于湖南大学。

大

学



◎陈戍国 校注



